



破与立:中国式农村养老秩序的嬗变与重构

陆杰华 孙 杨

[摘要]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和老龄化的特殊国情,中国农村的养老问题应当放在特定历史背景与客观环境中来理解与分析,形成具有乡土气息与中国范式的农村人口老龄化治理方案。在历史长河中溯源,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一套稳定的老有所养的实践逻辑,包括以自给自足的小农土地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秩序、以权责均衡的代际双向反馈为核心的家庭秩序、以近邻亲熟的村庄乡土社会为载体的社会秩序、以世代传承的孝亲敬老文化为根脉的文化秩序,全面彰显了中国乡土社会延续千年的独特智慧。随着时代推移和社会跃迁,生发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养老秩序出现近代嬗变,人口转变与疾病转型、城乡非均衡发展以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等带来全新养老挑战。未来,需在历史的经验中重构中国式农村养老的现代秩序,重塑土地、家庭、村落、孝道对于老有所养的当代价值和社会适应性,实现中国式老龄社会治理的本土自觉与自主原创。

[关键词] 中国式养老; 养老秩序; 农村; 老龄化

DOI:10.13240/j.cnki.caujsse.20250320.004

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成为全球重要趋势。中国从1999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以超大规模的老年人口逐渐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且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陆杰华,刘芹,2021),使老龄社会治理和养老问题成为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持续挑战。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年龄选择性迁移流动等历史问题的长期累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养老基础普遍薄弱,老龄化形势严峻,这是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点和难点所在(纪志耿,祝林林,2019;徐拓远,张云华,202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分别多达1.2亿和0.9亿人,占比分别为23.81%和17.72%,老龄化程度均高于同期的城镇水平,并先一步迈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除此以外,未来30年农村还将迎来劳动力老化带来的二次老龄化浪潮,这将进一步加重农村养老负担(陆杰华,郭荣荣,2023)。面对形势愈加严峻且不可逆的农村老龄化态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特别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问题研究”(22JJD840001)。

[作者简介] 陆杰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孙 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

“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进一步突出了农村养老领域改革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中,加快探索出一条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中国式道路,着力解决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的农村养老重大议题刻不容缓。

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塑造了特定的养老模式、制度与文化(杜鹏,王飞,2024)。有别于其他老龄化国家,中国的老龄化国情错综复杂,在人口规模、发展趋势、内部差异和形成原因等方面都具有突出特征。同样,区别于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社会,历经几千年兴衰变革的中国农村社会也有其基于自身环境特点发展起来的运行规律,费孝通称之为“乡土社会”(费孝通,2008:1)。因此,照搬先发老龄化国家的制度模式,或者简单嫁接城镇地区的经验做法,对于解决当前中国农村养老存在的若干现实问题来说是行不通的。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在特定经济制度、家庭结构、村落场域、文化特质的长久作用下,农村社会已经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实践性养老秩序(王增文,张文雅,2024)。这就决定了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国农村的养老问题也应当放在这一历史背景与客观环境中来理解,形成具有乡土气息与中国范式的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行动方案,满足农村老年人最真实、最迫切的养老需求。基于这一实践逻辑,笔者将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回溯传统乡土社会的自有养老秩序及其内在逻辑,并深入分析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农村养老秩序面临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尝试从中国农村养老的历史经验中汲取解决全球人口老龄化难题的“中国智慧”,对完善我国现行农村养老的制度安排和模式设计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式农村养老的传统秩序

如何走出一条契合农村和农村老年人实际需求的中国式农村养老道路,历史或许能给我们启示。在传统时期,中国乡土社会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祖祖辈辈生于斯死于斯。养老是每个人终将面临的问题,更是一个历史延续性问题,在延续千年的农村社会反复发生和作用。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中国农村在实践和历史中形成的关于养老的各种合理性要素,保障了农村社会的长久稳定运行,维系了乡土社会的基本秩序。即使是在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快速转变过程中,农村青壮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转移,人口转型与家庭变迁加速,严峻的老龄化形势并没有在农村爆发出显性的养老危机,而是仍存在较大的适应性调整空间,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农村社会内生的养老秩序起到了很大的稳定和缓冲作用。具体而言,农村的经济制度、家庭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特质共同构成传统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以其独具乡土逻辑的养老秩序回答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之道。

(一) 经济秩序:以自给自足的小农土地生产为基础

在中国农村,土地与农村居民有着天然的结合方式。传统农村家庭始终保持着对土地的高度依赖,世代以自给自足的小农户土地生产为经济基础,农村社会实际上是一种“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乡土形态(刘庚长,1999;费孝通,2008:2-3)。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农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是维持家庭生计的主要来源,使家庭再生产得以实现。农村生活成本低,加上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半径小、消费结构简单,通常过着理性简约的低消费生活(刘升,2024),通过基本的土地生产活动便可以实现自给自足,满足日常开支需求。不同于城市的商品市场,农村社会中粮食、蔬菜瓜果、牲畜家禽等生活必需物资都可以依靠田间地头的春种秋收获得,因此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生产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实现自养的重要形式(赵向红,王建华,2020)。对于农村老年人,土地还兼具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功能(贺雪峰,2019)。所谓“活到老、干到老”,一方面,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获取基本生活保障,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子女的供养负担,在家庭中能够有尊严地独立生活,体会到自我存在价值和成就感;另一方面,老年人适当从事农业劳动,延续生活作息规律和“闲不住”的习惯,也是一种消遣或休闲方式,有利于保持身心健康,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

农村老年人与土地相结合的“老人农业”形态,具有维持家庭生计、保障生活物品供应、实现社会和文化价值等多重功能,成为中国农村地区一种最基本且最原始的养老生态模式。在传统社会中,社会生产力低下,基础物资匮乏,老年人依附土地生产可以更多理解为出于家庭生计和自养的考虑,为了解决晚年的温饱问题而不得不付出劳动。到了现代社会,建立在土地制度基础上,老年人以田间种植和庭院养殖为营生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中国农村依然延续着较强的生命力,其投入成本低,重在挖掘老年人解决养老困境的内生能力,逐渐构成子女养老和社会保障的重要补充(夏柱智,2018;梁琦,2023)。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农村社会延续千年的小农土地经济秩序既实现了老年生活的过程性,也体现了老年人的主体性,是当前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现实基础和模式选择。

(二) 家庭秩序:以权责均衡的代际双向反馈为核心

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家庭对于中国社会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在传统农业社会,家庭一直是老有所养的基本单位和主要场域,养老责任完全由家庭内部承担(陈军亚,2018;陆杰华,谷俞辰,2024)。费孝通(1983)将其概括为代表中国文化特点的“反馈模式”。与西方社会的单向接力模式不同,中国亲子关系的反馈是一种资源在家庭代际间的双向流动与均衡交换模式,老人有着生育抚育教养子女的天然职责,子女也被赋予赡养父母的义务和伦理责任,这构成了中国农村传统家庭秩序的基本特征。以反馈模式为核心,传统家庭的老有所养也就成为必然秩序,为老年人提供了多方面的养老支持,最大程度满足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需求。这既包括经济支持,

子女通过农业劳动实现家庭自给自足,承担起经营家庭的重担;也包括生活照顾,子女负责老年人的饮食起居和生病照料;还包括精神慰藉,子女给予老人心理关怀,帮助其消解苦闷孤独,与老年人共享天伦之乐。传统小农户的农业生产和家庭劳动力配置方式,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村家庭养老秩序的稳定运行。一方面,传统农村社会的居住模式是相对封闭、族群式的,一日三餐同处一个屋檐,家庭成员、关系和功能有较强的完整性,在时间和空间上为赡养老人提供了现实可能;另一方面,在传统农业社会,拥有象征父权的长辈在家庭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被赋予了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和家庭资源的分配权(肖瑛,2020)。这种以父权为代表的长幼秩序和制度权威,使子女赡养老人成为传统社会中相当稳定的法定义务与伦理责任,也让养老质量得到了保障。

在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世界里,家庭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着本源性的价值和意义。无论是家庭代际关系,还是家庭的结构和功能,农业社会的传统家庭在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较强的稳定性和完整性,催生了以代际双向反馈为核心的家庭养老秩序。同时,这一赡养秩序的定型与存续,也与传统居住模式和父系父权制度密不可分。老年人能够得到来自子女在经济供养、生活照顾、精神慰藉等多方面的支持,即使发展到现代社会,这也是老有所养的基本要求。传统中国社会的反馈模式,不仅将养老责任家庭内部化,而且规定了养老义务、权责、模式、伦理等的基本秩序,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农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强大韧性,也为全球第二次人口转变趋势下促进代际共融和家庭建设提供了本土化治理思路。

(三) 社会秩序:以近邻亲熟的村庄乡土社会为载体

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以血缘关系和地缘认同为基础的熟人社会组织形态(宋丽娜,2009),构成了千百年来农村老年人养老的重要社会基础。第一,村庄熟人社会是老年人的精神依托。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落叶归根”的思想观念。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与乡土社会,承载了老年人漫长人生经历的精神寄托,容易让人产生归属感,是走向生命晚期的老年人希望的最后归宿。第二,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村庄熟人社会有互助养老的社会性资源。熟人社会注重的是人情往来,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亲帮亲、邻帮邻”,这是乡土社会中农民的淳朴底色。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基础上,老年人在长期人际交往和社会互动中形成的互帮互助默契,往往能够化解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矛盾(徐勇,2013;吴春梅,2019),以低成本的和諧方式维持老年人的正常生活秩序。第三,村庄社会是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空间,这里有亲人、近邻和老友,能够让老年人在自在、舒适、熟悉的社会网络中感受到关怀与温暖。因此,村庄还是老年人人际交往的社会载体。第四,村庄熟人社会的礼治秩序在实现老有所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王露璐,2015)。传统乡村礼治维系着整个乡土社会的孝养秩序,有悖情理道德的不孝行为会受到村庄舆论的谴责,甚至村庄规范的约束规制。

在乡土社会中,村庄对于农村老年人是一个很关键的存在要素。以近邻亲熟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在稳定的守望相存共同体中形成精神寄托、生活载体、人情互助、孝养礼治等基本社会秩序,很大程度上支撑起了老有所养的社会基础。作为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基本组织单元,村庄之于养老的社会秩序依靠乡村社会内部自组织的力量、资源和环境,以合理有效的治理逻辑和实践机制,为老年人提供了物质、社会和文化多重功能和价值,维系着乡土社群的稳定结构和熟人社会的长久运行,彰显了乡村社会解决养老问题的独特智慧,更为中国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提供了一个以熟人社会为重要载体的基本面向。

(四)文化秩序:以世代传承的孝亲敬老文化为根脉

在深厚的中国文化中,孝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永恒话题。几千年来,百家经典中有对孝义、孝行、孝道深刻而详细的阐释,有关孝的各种民间实践和传说被广泛颂扬与传承,历朝历代倡导以孝治天下,将孝融入人才教育、社会伦理、官吏选拔、国家法度等制度体系(彭希哲,郭德君,2016)。从价值观念到制度化,再到法制化,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地位不断被巩固强化,对维系国家和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黑格尔(2006:114)在《历史哲学》中指出,中国社会纯粹建筑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简单来说,孝就是子女对父母和长辈的善行和美德。孝老不只限于简单的赡养行为,更表现为要在内心深处真诚地感恩、尊敬老人(陈友华,2013)。从人伦关系上讲,孝是作为人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是子女对父母和长辈最自然的表达。孝文化随着世代的更替而接续传承,在孝义上不断丰富创新,在孝行上要求外在行为与内心情感高度统一,在孝道上通过伦理道德、社会制度和法律震慑予以强化推行,逐渐凝聚成了传统农业社会老有所养的文化秩序,深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和中国家庭。

以孝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根植于人与人之间最紧密亲近的血缘和亲缘关系,具有区别于其他社会文明的鲜明特色,是几千年来维系传统农业社会养老秩序的文化根脉。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养老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体现国家和民族文明品格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景天魁,2018)。从个人家庭到国家社会,中国孝文化在传统农业社会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及评价监督机制,一直到今天,仍对家庭和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提供了化解当前中国式农村养老难题的基因钥匙。

二、中国式农村养老传统秩序的近现代嬗变

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国农村社会依靠内生资源和环境,逐渐形成了解决养老问题的稳定的经济秩序、家庭秩序、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乡土社会老有所养的深厚基础,塑造了特色鲜明的中国农村传统养老模式。然而,随

着经济社会朝着现代化转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市场经济发展和消费模式转变动摇了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韧性,家庭结构、功能和关系转型,家庭养老功能式微,城镇化进程加快引发村庄社会结构和秩序松动,传统孝道日渐衰落,家庭伦理观念蜕变,乡土社会的自有养老秩序被逐渐打破。

(一) 经济秩序之变

建立在土地制度之上的小农户生产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奠定了传统养老秩序的经济基础。伴随工业化和市场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快速变动,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刻重构着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家计模式,从而打破了农村养老的传统经济秩序。一方面,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里,老年人通过农业种养不仅能够获得日常所需生活资料,还可以将剩余的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换取货币收入,以购买其他生活资料,实现家庭再生产。然而,在工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价值评价体系中,农产品与农业劳动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和边缘地位,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使得农业生产收益十分有限,不足以满足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消费开支。另一方面,社会的整体生活成本上升,农村家庭自给自足能力大大降低,以种地为生的家计模式难以维系。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快速跃迁,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升。从主要停留在生计维持的粗放模式到生活需求日渐丰富多样化,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不管是赡养老人还是抚育下一代,都不再只是“多个人多双碗筷”那么简单。除此以外,城镇化加速推进导致的大规模土地流转也在重塑农村养老的经济秩序。在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下,土地流转割裂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天然联系,农村老年人只能依靠有限的土地租金或补贴维持独立生活。老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耕地保障,农业收入大大减少,还不得不改变长期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原本靠耕种就能获得的生活资料也都需要到商品市场购买,被高昂的生活成本所裹挟,给以土地为基础的自给自足传统养老经济秩序造成沉重负担(熊金武,黄义衡,2015;李永萍,2015)。

无论是社会进步的历史必然,抑或土地制度的调整,都动摇了农业社会的经济根基,打破了传统养老经济秩序的平衡,单纯依靠“老人农业”养老形态难以满足现代社会的基本养老需求。也正是经济秩序的松动,农村家庭以乡土为根基的传统生计模式朝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转型,由此引发了家庭秩序、村落社会秩序甚至传统文化秩序的历史性流变,中国乡土社会的养老支持体系逐渐被打破,造成了人口快速老龄化形势下潜在的农村养老危机。

(二) 家庭秩序之变

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中国家庭的结构、关系和功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改变了传统农村家庭原有的稳定秩序。代际双向均衡的反馈模式被打破,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式微。随着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家庭子女数减少,小型化、核心化家庭增多,家庭结构逐渐呈现出“倒金字塔式”的鲜明特征。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子女养老负担大幅

增加。与此同时,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量青壮年流向城镇,空巢家庭比例上升。如此一来,传统乡土社会的代际同居模式,到现在只剩下老年人独自留守,使得老人的日常生活照料长期缺失,代际情感距离也被逐渐拉大。家庭代际关系式微甚至异化也是当代家庭转变的一个突出特征,导致权责均衡的代际反馈秩序失衡。现代家庭的权力中心逐渐从传统父权向下一代转移,家庭资源分配出现“伦理转向”(狄金华,郑丹丹,2016)。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威下降,在代际资源分配中逐渐让位于子女。在家庭贡献中,老年人的代际责任却在传统家庭伦理秩序的坚守与妥协中不断增强,越来越需要为子女乃至孙辈操劳买房、彩礼、结婚、隔代照料等人生要务(王跃生,2011)。这种渐趋单向的、不平衡的代际反馈关系使得子女反哺和赡养功能不断弱化。

相比传统农业社会的大家庭,现代家庭的规模、结构、关系样态都越来越趋向小型化、核心化、空巢化和离散化,无疑给子女带来了繁重的养老负担,在经济、时间和精力上都面临巨大压力。长此以往,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得不到充分保障,养老质量自然而然下降。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以代际均衡反馈为核心的传统家庭养老秩序被打破,子女对老年人的伦理责任和情感关系日渐式微,不同程度上动摇了传统家庭老有所养的内在韧性。

(三) 社会秩序之变

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不仅弱化了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更在瓦解乡土社会的养老秩序。在大规模乡城人口流动的宏观背景下,农村人口持续减少,村庄从一个庞大的熟人社会网络,到只留下脆弱的老人孤独守候。农村作为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空间,其人口快速减少使老年人的社会关系网萎缩、人际社交单一化。随着子女纷纷远离,老友慢慢老去,农村老人逐渐失去乡土社会的人文关怀和精神慰藉。传统农村社会可以依靠自组织力量实现老有所养,然而随着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走向城市,农村原有的养老资源和服务也一并带向城市,瓦解了传统乡土社会形成的内生养老治理体系,从而出现社会转型期农村养老的“组织真空”(王瑜,程令伟,2023)。伴随村庄熟人社会的慢慢瓦解,传统乡村社会的礼治规范也逐渐失去效力。由于乡村人口流失和结构变动,建立在传统礼治秩序基础上的村庄养老规范也因缺乏组织执行能力而走向衰败。传统意义上的村庄舆论监督逐渐退出乡村社会舞台,家庭赡养行为很难再受到村庄社会礼治的严格约束,孝养行为及其标准从村庄集体规范转向家庭自决(庞丹丹,2021)。

近代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不断蚕食农村的自有养老力量和资源,打破了农村养老的传统社会秩序。伴随农村老有所养的社会资源、熟人网络、人文关怀和礼治规范流向城市,农村社会逐渐失去了发挥养老功能的社会基础,导致解决养老问题的内生能力不断被削弱。在农村老龄化加速甚至出现明显的城乡倒置的形势下,乡村社会秩序的嬗变使得农村不得不需要依赖外部力量和资源,老有所养面临的风险和

挑战更为严峻。

(四) 文化秩序之变

在当今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引发了家庭秩序和乡村社会秩序的变革,也对乡土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根植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孝道文化出现近代嬗变。首先,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农业化到工业化,传统孝道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基础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家庭权力关系和等级关系愈发趋向民主化、平等化,一些传统孝道的糟粕观念和惯习应予以摒弃,当代孝道文化需要被赋予新的内涵,这体现为传统孝道文化随社会变迁的自适应性(钟涨宝等,2017)。其次,传统孝道观念呈现衰落倾向,孝道标准不断降低。随着个体自由主义的兴起,家庭代际情感连接减弱,人们孝亲敬老的意识逐渐淡化,常常把赡养老人当成负担,只为老人提供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甚有很多农村地区,对子孙孝顺的评判只流于一场体面的葬礼。再次,传统孝道规范日渐式微。随着村庄宗族制度和家庭父权制度走向消亡,农村社会的孝道评价与监督机制崩解,仅靠道德伦理难以对个人行为形成有效的约束。最后,孝道情感与养老行为脱轨。劳动力乡城流动产生了大量农村空巢家庭,这是城镇化进程中很多农村年轻一代追求生计的被迫抉择。子女养老由于时空隔离而备受约束,老人需求也在有限的家庭资源竞争中不断被压缩。孝而难养,心有余而力不足,逐渐成为当前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普遍面临的现实困境(许惠娇,贺聪志,2020)。

孝道是孝养行为的思想前提。随着经济社会基础的改变,延续几千年的传统孝道文化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子女孝养行为呈现出新方式和新特征。在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孝道文化尚在经历自适应转型,传统养老伦理观念式微,子女养老的内心情感与实际行为在现实抉择中逐渐分离,使得传统农村社会老有所养的文化秩序有所松动,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养老问题和伦理道德危机。

三、中国式农村养老传统秩序面临的新挑战

在经济社会发展变迁进程中,中国农村传统养老秩序的嬗变打破了既往乡土社会老有所养的稳定形态,农村的养老功能不断弱化。与此同时,时代变迁中出现的一些新形势、新现象和新问题,如人口转变与疾病转型、城乡非均衡发展以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等,对农村养老秩序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一) 人口老化与疾病转型交织,农村老年人照护负担加重

从宏观上看,人口老龄化造成了严重的农村养老问题。具体到单个家庭也是如此,人口老化给家庭成员带来了沉重的养老负担。受限于社会条件和医疗水平,中国过去的人口呈现“高死亡水平、低人均寿命”的变动模式(刘岚,2002)。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我国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居民平均预期寿命

显著增加,截至2023年达到78.6岁^①。预期寿命的提升客观上延长了老人晚年的生命周期,家庭养老时间线被拉长,增加了子女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赡养负担。尽管农村老年人大多选择继续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以减轻下一代的赡养压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劳动能力逐渐下降,自养的可行能力降低,仍需要依靠子女赡养。在中国传统代际反馈模式中,一代人有上一代人的养老责任。但在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背景下,家庭内部不同世代间生命历程叠加环扣,多代老人同堂的现象逐渐增多。这意味着低龄老人不仅要解决自身养老问题,还要兼顾上一代高龄老人养老,家庭养老负担进一步加重。

人口老化叠加流行病学转型,慢性疾病日益成为威胁老年人生命健康的主要疾病类型,这是今后农村养老面临的一大严峻挑战。当前,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普遍面临较大的疾病风险。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结果显示,70%以上的农村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农村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不断增多(陆杰华,孙杨,2024)。农村老年人罹患疾病的扩张,一方面需要支出大量医疗费用,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需要有人进行疾病照护,对子女的时间和精力保障都形成较大挑战。人口老化与疾病转型交织,赡养老人的生命周期延长,赡养强度增加,这都是传统社会没有出现过的新现象,也是依靠农村传统养老秩序的内生能力难以应付的新问题。

(二)城乡养老资源发展失衡,农村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突出

在传统养老秩序嬗变和人口与疾病转型新挑战的多重冲击下,农村出现了较大的养老缺口,需要外部政府和社会力量予以补齐。然而,受长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一直遵循城市偏向的发展思路,导致养老资源和服务城乡发展失衡,农村地区的公共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明显短板。尤其是老年人最需要的优质医疗资源和医疗服务人才都向大中城市集聚,农村基层医疗服务保障严重不足。再加上城乡职业结构和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存在明显差异,农村养老保险给付标准和保障水平有限,老年人基本养老金收入明显偏低。医疗保险报销比例低、自付压力大,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长期困扰农村老年人。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短板还体现在市场力量参与严重不足,多元化供给主体体制和模式尚未发展成熟。现有市场化养老主要瞄准的是中高收入的老年群体,针对农村老年人收入特点的普惠型服务机构还非常少。这主要是因为,养老服务行业投资周期长、利润低、经营难度大,是一个需要持久深耕的慢产业。近些年来,尽管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其能够在农村零散“落地”,但却“生根”艰难,农村老年人难以享受到全面而优质的养老服务。

随着城镇化和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照顾和长期护理需求越来

^① 数据来源于《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越大,但城乡养老资源和服务发展严重失衡,农村地区难以发展起完善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使得农村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突出,这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痛点和难点所在。

(三) 数字化社会转型加快,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困难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信息科技革命正在对世界产生全方位的深刻影响,为现代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这些都是在传统农业社会无法想象和实现的。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加强了老年人与朋友、亲人、子女之间的瞬时交流,不仅增强了情感连接、缓解了孤独感,还拓宽了信息获取渠道,使老年人在网上就能了解外界信息、购物、政务办事等,促进了社会参与、丰富了老年生活。然而,受制度、技术、文化和老年人主体因素的制约,数字化时代农村老年人面临数字接入沟、知识沟和使用沟的挑战(陆杰华,韦晓丹,2021)。具体表现为,我国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数字接入和可及性普遍滞后;受自身知识水平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农村老年人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较弱,再加上大部分老年人的子女都不在身边,缺少了年轻人的帮助,老年人使用各种智能化设备更是无从着手;很多智能设备和软件的设计、开发、场景应用面向的是年轻受众,缺乏年龄数字包容,其在让年轻人享受便捷的同时,却使农村老年人的数字生活屡遭困难。

从传统社会的乡土生活转向现代社会的数字生活,农村老年人的自适应性和外在环境条件都面临诸多困难,一旦解决不好,数字社会的极大便利可能会逆转为农村老年人现实生活的巨大鸿沟,让农村老年人在数字技术的裹挟中与时代发展渐行渐远,成为被社会排斥的“数字难民”,从而产生新的农村养老困境。

四、重构中国式农村养老现代秩序

在社会的变迁过程中,中国农村的内外部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养老秩序出现近代嬗变,同时面临新人口形势、新制度形态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全新挑战。农村社会的传统养老秩序被打破,自有养老功能不断弱化。为此,急需农村养老秩序的当代重构,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寻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危机的现实出路。

(一) 树立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推进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略,也是中国式养老道路的鲜明特征。重构中国式农村养老现代秩序,首先要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超越资本逻辑和个人中心主义逻辑,树立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农村的全面发展。在实践遵循上,中国式农村养老要以坚持老年人主体地位为发展原则。老年人并不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中国农村也不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要着眼于满足农村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着眼于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将农村老年

人置于农村社会中,尊重历史演进规律,尊重农村社会的乡土底色,尊重老年人的自主养老选择。致力于保障和改善乡村民生,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要关注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考虑到农村发展的现实情况。在路径选择上,中国式农村养老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使自身不断强大起来,这是破解养老困境的唯一出路。中国式农村养老道路要坚持适合自身发展的“自主原创”,积极认识老年人和农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唤醒农村养老传统秩序的蓬勃生命力,提高农村自有养老秩序的时代适应性,增强老人的自我养老能力,再续农村社会的内生养老功能。

(二) 完善以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养老保障体系

土地对于农村发展和老有所养的价值意义是多方面的,中国式农村养老秩序依然需要建立在土地这一客观现实条件之上,从而完善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一方面,要促进农村老年人生计型农业向休闲型农业转型,尊重老年人的自主耕种意愿,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充分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土地使用权,加大农业资金支持和科技投入,因地制宜发展田园耕种、庭院养殖、庭院特色经济等生态农业模式。根据农村常住人口变动趋势,开展农村土地整合与重新规划,多方式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小农户农业增产增收,强化农村低龄老年人的土地自养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现行养老金制度改革,探索符合农村劳动力和农业产业逻辑的养老金制度体系。将农村养老金制度改革与发展定型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加快改革现行养老金制度的市场逻辑和工业逻辑设计方式,国家和政府加大对农村老年人养老金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的补贴力度,提高农村养老金的实际待遇水平,建立农村高龄老年人津贴制度,保证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公平和基本保障作用,实现对农村老年人土地养老和家庭养老的强力补充和接续,为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提供稳定的经济保障,从根本上消除农村老年人养老的后顾之忧。

(三) 健全以家庭为核心的养老服务体系

家庭对于老年人来说有其他任何社会组织都无法比拟的独特情感和赡养优势,是农村养老保障的基础环节。重构中国式农村养老秩序,要围绕家庭展开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首先,加强家庭建设,增强家庭韧性。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子女承担赡养父母的第一责任。健全全生命周期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将关注点从老年人逐渐扩展到所有家庭成员,增强家庭内部不同代际的发展能力,降低农村家庭的养老脆弱性。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加快制定促进农村家庭育幼支持和养老支持的政策措施。以中年一代为核心,重点解决养老照护的时间支持问题。鼓励、引导和规范用人单位营造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推动实现“工作—家庭”平衡。针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性特点,为有老年人照料需求的劳动者提供带薪弹性休假探亲制。其次,健全农村“家边”养老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惠及广大农村老年人的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充分考虑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的需求

特点,结合农村社区的资源条件,既要做好农村养老服务的兜底保障,解决高龄、失能、认知功能障碍老人的刚性照护需要,也要满足农村老年人生活照顾、健康保健、长期照料、精神文化等全方位的基本养老需求。推动优质专业化养老服务资源下沉,市县连接到乡镇,乡镇连接到村社,社区延伸到家庭,探索建设辐射周边地区的区域性农村社区居家服务中心。

(四) 加快补齐农村养老基础设施短板

乡村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社会载体和主要场域,重构中国式农村养老现代秩序,要遵循乡村社会发展规律,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立足老年人实际需要和地方实际,加快补齐农村养老基础设施短板,全面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能力,打造老年人宜居的和美乡村风景。首先,加快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系统推进农村卫生厕所、清洁厨房、安全饮用水、村容村貌、道路网络、生活垃圾与污水处理等人居环境整治提档升级,加快农村住房的适老化改造行动,健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和管理维护服务机制,提升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和养老质量。其次,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实现农村地区互联网和物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的全面覆盖,提高农村地区智慧物流的覆盖范围,推广数字化智能设备和服务的适老化应用,加强数字技术学习指导和培训,提高老年人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加快弥合农村老年人数字鸿沟。最后,加快农村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加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力度,健全县级、乡镇、村社多级医疗服务与应急反应体系,保障好乡村基层卫生机构的基础医疗设施、服务床位和专业人员,改善村级医疗机构就医条件,全面提升基层健康保障能力,落实老年人看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更早一分钟”,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便捷、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五) 赓续中华民族优秀孝养文化根脉

重构中国式农村养老现代秩序,还要留住彰显国家和民族文明品格的文化根脉。坚持扬弃创新,在现代语境下赋予传统孝道伦理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使命,实现优秀孝养文化的古今贯通。以高度文化自觉自信传承与弘扬融于中华民族血缘亲情的最朴素、最根本的传统美德,将弘扬孝文化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孝文化宣传教育,营造孝亲敬老的和谐乡村社会氛围和社会环境,重塑人们对孝养观念的认知和理解,让孝道美德重在行动、记在心里。加强以孝道为基础的家风家教建设,重视优良家风对于家庭成员孝道的引导作用,构建和谐的新型家庭关系,强调父母长辈要以身作则,对子女孝道践行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完善孝道伦理道德的社会评价体系,建设现代乡村的村规民约体系,重塑乡村社会的公共伦理道德秩序,强化子女在物质与精神、行动与思想上的多重孝养责任,充分利用社会公共舆论和孝道立法对孝养伦理失范行为加以规制和纠正,推动形成良好的孝亲敬老社会风气,让乡村社会有老有所养的坚实的精神支柱。

五、余论

在历史长河中溯源,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一套以土地、家庭、村庄、文化为基础的养老秩序,依照其自有逻辑保障了老有所养的稳定实现。这种秩序没有成文的制度规定,也没有他者的现成经验,而是依靠乡村社会内部的人口、资源和环境不断实践和调试而形塑出来的,彰显了中国乡土社会延续千年的独特智慧,为当前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源,甚至为全球老龄化的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方案。

随着时代推移和社会跃迁,生发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小农经济、代际反馈模式、村庄社会和孝道文化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传统养老秩序的稳定形态被打破,农村社会的自有养老功能逐渐弱化。与此同时,人口与疾病转型、新技术革命、城乡非均衡发展等新现象的出现,对现代社会的农村养老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也对农村社会养老功能的有效发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如此,农村社会的传统养老秩序并没有完全失去生命力,依然在悄无声息中以其低成本的自有方式发挥着老有所养的强大韧性,土地、家庭、村落、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农村养老依然具有其特有的内在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推进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破解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的养老难题,需要不断提高农村传统养老秩序的社会适应性,唤醒其时代生命力,找回属于乡村社会的生活烟火气,重塑乡村活力。避免先入为主导致的理念偏差、路径偏差和政策偏差,应当超越城市逻辑、工业化逻辑以及先发老龄化国家的经验逻辑,将农村养老置于中国农村社会的乡土语境,尊重农村社会的自有演进规律和底层逻辑,尊重农村老年人的自主养老选择和意愿需求。一座老宅、两分薄田、三餐粗茶淡饭、四世同堂共叙天伦、十指链接精彩世界,未尝不是一种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中国式农村养老图景。在历史的经验中重构中国式农村养老的现代秩序,实现老有所养的本土自觉与自主原创,从而走出一条有经济基础、有健康保障、有情感关怀、有价值存续的中国特色农村养老道路。

[参考文献]

- 陈军亚,2018. 由家到国、家国共责:“老有所养”的中国治理进程——基于大型农村实地调查的认识和启示. 政治学研究(4):58-67
- 陈友华,2013. 社会变迁与老年文化重构. 人口与发展(5):78-88
- 狄金华,郑丹丹,2016. 伦理论丧抑或伦理转向: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 社会(1):186-212
- 杜鹏,王飞,2024. 中国式养老:内涵、特征与发展. 社会建设(1):3-23
- 费孝通,1983.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6-15

- 费孝通,2008.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
- 贺雪峰,2019.如何应对农村老龄化——关于建立农村互助养老的设想.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58-65
- 黑格尔,2006.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 纪志耿,祝林林,2019.中国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理论基础、形势判断及政策优化.农村经济(5):105-111
- 景天魁,2018.传统孝文化的古今贯通.学习与探索(3):40-46
- 李永萍,2015.“养儿防老”还是“以地养老”: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分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103-112
- 梁琦,2023.从物质生产到价值生产:中西部农村老年人以地养老的转化逻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6):88-98
- 刘庚长,1999.我国农村家庭养老存在的基础与转变的条件.人口研究(3):41-42
- 刘岚,2002.对“古代中国人寿命与人均粮食占有量”的质疑.人口研究(2):70-72
- 刘升,2024.半耕半保:转型期农村老人家庭的养老经济基础研究.农村经济(2):114-124
- 陆杰华,谷俞辰,2024.中国式养老的现实定位、关键议题与转型进路.人口与经济(5):1-12
- 陆杰华,郭荣荣,2023.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劳动力老化:发展趋势、机理分析与应对路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5-21
- 陆杰华,刘芹,2021.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的特征、影响及其应对策略——基于“七普”数据的解读.人口与经济(5):13-24
- 陆杰华,孙杨,2024.中国农村老龄健康:特征、成因与应对方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49-67
- 陆杰华,韦晓丹,2021.老年数字鸿沟治理的分析框架、理念及其路径选择——基于数字鸿沟与知沟理论视角.人口研究(3):17-30
- 庞丹丹,2021.无为之孝:无为何以为孝?——基于江苏北部葛口村的田野调查.中国农村观察(3):100-113
- 彭希哲,郭德君,2016.孝伦理重构与老龄化的应对.国家行政学院学报(5):35-41
- 宋丽娜,2009.熟人社会的性质.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118-124
- 王露璐,2015.伦理视角下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的“礼”与“法”.中国社会科学(7):94-107
- 王瑜,程令伟,2023.城乡关系变迁与农村养老的社会建设.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73-83
- 王跃生,2011.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维系、变动和趋向.江淮论坛(2):122-129
- 王增文,张文雅,2024.社会行动理论下农村养老秩序的形塑机制与路径选择.现代经济探讨(10):104-113
- 吴春梅,2019.新时代农民守望相助的存续.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180-186
- 夏柱智,2018.以地养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选择.南方人口(5):63-71
- 肖瑛,2020.“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中国社会科学(11):172-191
- 熊金武,黄义衡,2015.失地农民养老困局与对策浅析.农村经济(3):85-89
- 徐拓远,张云华,2021.“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思路与举措.改革(10):31-40

徐勇,2013. 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 中国社会科学(8):102-123

许惠娇,贺聪志,2020. “孝而难养”:重思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困境.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101-111

赵向红,王建华,2020. 家庭农业与农村养老:互嵌性的实践反思与创新路径. 江海学刊(4):116-121

钟涨宝,李飞,冯华超,2017. “衰落”还是“未衰落”? 孝道在当代社会的自适应变迁. 学习与实践(11):89-97

Disintegration and Rebuilding: The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style Rural Elder Care Order

LU Jiehua SUN Y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uniqu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aging, the elderly care issue in China's rural areas should be understood and analyzed with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and objective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develop rural aging governance plan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hinese paradigm. Historically,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has formed a set of stable practical logics for caring for the elderly, which fully demonstrates the unique wisdom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that has las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ncluding the economic order based on self-sufficient small-holder land production, the family order with the intergenerational two-way feedback mode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balance as the core, the social order with the familiar and neighboring village society as the carrier, and the cultural order rooted in the culture of filial piety that has been inheri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elderly care order produced i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has undergone modern evolution, and new phenomena such as demographic and disease transition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mbalances bring new elderly care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modern order of Chinese-style rural elderly care by learning from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reshaping the contemporary values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of land, family, village, and filial piety in relation to the elderly, so as to achieve the indigenous consciousness and independent originality of Chinese social governance in elderly care.

Keywords Chinese-style elderly care; Elderly care order; Rural areas; Aging